

巴别尔短篇小说中的“父与子”主题

谢春艳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父子冲突一向是西方文化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文学沿袭了“父与子”文化母题的原始形态,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化的主题模式。巴别尔的艺术世界呈现为父辈的绝对权力和威严走向衰落和崩溃,子辈取代父辈登临历史舞台。巴别尔小说的主要人物结构印证了从人的普世价值出发重构父亲形象的可能性。在此巴别尔并不意在进行道德价值的正负判断,而是以道德分裂的状况寓言式地理解和呈现文化变迁的事实。

关键词: 巴别尔; 短篇小说; 主题; “父与子”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讲的是一个犹太人来到拉比¹面前问道:“拉比,我的儿子接受了基督教,我该怎么办呢?”拉比答曰:“上帝会同情您的,但是上帝也有同样的问题”。“父与子”是人类血缘关系中最本质、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环。“在一定意义上,希伯来文化的第一个主题便是‘父与子’的冲突,它存在于整个《旧约》文献,甚至被理解为人类创造之前就已注定了的超验模式。”(刘洪一 1992: 38)“父亲”一词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历史意义。它往往象征着“生命”、“权威”、“秩序”、“传统”、“历史”、“中心”和“文化本原”等。而“父与子”则同“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范畴之间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

2 “父与子”: 巴别尔笔下的普世话题

父子冲突一向被视为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与子”。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父子关系大多呈现为父弑子的形态,但在俄狄浦斯的神话中却是子弑父。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一向是西方文化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主题之一。由此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²更用“俄狄浦斯情结”来探究其中隐含的深层原因。

人类历史和文明正是从“父”到“子”代代相传,才得以延续久远。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文学沿袭了“父与子”文化母题的原始形态,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化的主题模式。不同俄罗斯作家对“父与子”这一主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 186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880)、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1865),到别雷的《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 1911—1913)、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

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1945—1955)等,众多作家从不同视角对“父与子”这一母题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和生发,努力在文字中呈现、诠释、建构父子主题,探究其中寄寓的道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父亲”拥有无可置疑的统治权和支配权、“父亲”起主导作用的世界被彻底毁灭。这是“父亲神话”和宗法制度的崩溃。面对出卖信仰和灵魂、违逆父权、背弃“伙伴精神”的亲生儿子,塔拉斯的父亲形象释放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权威性和强大的震慑力。此时此刻塔拉斯之子安德烈不仅威胁到全体哥萨克的利益,而且直接挑战父子秩序。于是“父爱子”化为义无反顾、毫不留情地对儿子的判罚和处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父亲塔拉斯在儿子面前扮演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角色。但是,小说中父权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塔拉斯正在失去精神引领的价值。

巴别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精神和文化分裂的时代。时代的分裂引发无法愈合的家庭悲剧——亲子弑父、恶父弑子。由此,无论在短篇小说集《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 1922—1937),还是在《敖德萨故事》(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1931)中都存在着与《塔拉斯·布尔巴》相同的“父与子”主题。巴别尔的艺术世界呈现为父辈的绝对权力和威严走向衰落和崩溃,子辈取代父辈登临历史舞台。从表层看,在巴别尔的文本中对于父子冲突、“反抗父法”的描写和对“父亲”的塑造超越了传统,并对“父亲”形象进行了残酷的解构和颠覆。实质上,父子之间从亲近、顺从,到矛盾、悖逆、决绝,其深层所折射的却是特定情景下人类文化模式转型、对话、更新、求变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断由自在、自发状态走向自觉、自为状态的演进过程,其中所体现的是人的尊严、自由、个性得以发现、认同和确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父子冲突、对话、和解也是人类文化冲突、对话与和解的历史。巴别尔小说的主要人物结构印证了从人的普世价值出发重构父亲形象的可能性。在此巴别尔并不意在进行道德价值的正负判断,而是以道德分裂的状况寓言式地理解和呈现文化变迁的事实。

3 “父弑子”与“子弑父”:“父子关系”的解构

《家书》(Письмо)作为《骑兵军》的经典篇目,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力。小说是主人公瓦西里·库尔丘科夫口述的一场特殊时代背景下“父杀子”、“子弑父”的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集中体现了“父与子”的母题。库尔丘科夫是一个稚气未脱、乳臭未干的少年。与两个哥哥相同,他加入了红色骑兵军,成为布琼尼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库尔丘科夫的父亲季莫菲伊·罗季翁奈奇则走上了一条与三个儿子完全相悖的反革命道路:在反抗苏维埃政权的邓尼金部队当了连长。“父与子”变成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家信中库尔丘科夫向母亲和亲属一一问候之后便开始事无巨细地问起“斯捷普卡”的情况来:

“请您来封信吧,告诉我,我的斯捷普卡活着还是嗝儿屁了,求您好好照料它,写封信来告诉我——它绊蹄伤了的那条腿好了还是没好,还有它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马掌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天天都给它用肥皂洗前腿,我留了块肥皂在家里,搁在圣像后边,要是叫爹用光了,就劳驾您上克拉斯诺达尔去买一块,您做了好事,上帝不会抛下您不管的。”(巴别尔 2016b: 11)

库尔丘科夫给予“斯捷普卡”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此亲切,如此温暖,令人感动。行文至此,读者定会认为“斯捷普卡”是库尔丘科夫家中的一员。事实上,“斯捷普卡”是一匹牡马的名字。接着小说将“父子反目”这一世间最悲凉、最可怕的画面冷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父亲亲手杀死了落入其手中的俘虏、他的儿子、红军战士费奥多尔,父亲“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割到天黑。”(巴别尔 2016b: 12)库尔丘科夫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用冷酷无情的口吻仔仔细细地讲述着一个似乎与自己绝无关的、残忍至极的故事,漠视残酷的凌迟。父亲的暴虐招致另一个儿子谢苗的激烈报复,后者用绝对异端的弑父方式来反抗父权,反抗绝望。巴别尔对“父与子”母题的移用,遵循了传统的“父与子”结构程式。以“革命”为父与子冲突的焦点,对

革命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巴别尔笔下父子冲突的主要标志。

然而，短篇小说《家书》中真正的可怕，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本身，而是库尔丘科夫对此所做的反应。故事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在库尔丘科夫身上丝毫感受不到稚气少年的人格设定，反而拥有与其年龄不符的老练和沉稳。父亲与兄长之死在他的眼里变得平淡无奇，他用同一种表情讲着不同的事情，语调中不带一丝情感，没有任何态度。畸形的时代带给主人公库尔丘科夫畸形的生命价值评判尺度。在库尔丘科夫心中，亲人的死与马腿上的疥疮，父子相残与宰头小花猪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属于生活中一些琐碎之事，毫不足怪，也不新奇。“父弑子”与“子弑父”同样情无可原，理无可恕，但在小说中骇人听闻的悲剧却不过是顺便提及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库尔丘科夫所述“家书”的内容首先是其以特有的农民式思维一件件细数家常琐事。显然，库尔丘科夫对于维持基本生存必备的家什和家业兴旺的象征——“马”的关切程度远胜于对家人的亲情关爱。虽然库尔丘科夫没能亲眼见证哥哥除掉父亲的最后一幕，虽然外表稚嫩、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库尔丘科夫远不能像谢苗那样用最残酷、最精妙的杀人手段取父亲的性命，为兄报仇。但库尔丘科夫将作战勇敢、杀敌致果的哥哥谢苗奉为英雄，将战斗功绩、名誉、声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利益置于首位，毫无疑问，库尔丘科夫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这是巴别尔留给读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库尔丘科夫将自己与哥哥一起落到父亲手中时所遭受的痛苦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承受的苦难进行比较绝非偶然。至高无上的上帝把自己惟一的儿子奉献给人类，耶稣基督之死是为世人赎罪，而库尔丘科夫兄弟遭遇父亲的毒手，只因为他们三人与父亲分道扬镳，站到了“红军”一边，成了“红色狗腿子”。他们的选择寓言式地表达了对“父亲”的叛离和反抗，意味着“父亲”的权威遭到了拆解。“在《骑兵军》中老者的形象是毁灭的化身和死亡的象征。”（Подобрий 2008: 229）叙述者柳托夫既没有对群起抗父、杀父的库尔丘科夫兄弟给予评价，也未对发誓“为了正教，我要把我的骨肉一个不留地干掉”的父亲表示任何态度。然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强烈的态度表达。

4 从父权至上到“日薄西山”：“父子关系”的重构

《日薄西山》（*Закат*）是《敖德萨故事》的中心作品之一，讲的是在别尼亚·克里克“称王”之前其与弟弟廖夫卡、姐姐特沃伊拉联合起来反抗“出了名的凶神恶煞”——父亲门德尔·克里克的故事。小说最核心的冲突来自父与子，包括权威和反权威的冲突。“重生”是小说有别于巴别尔其他作品的最突出特点，它表现在“父与子”没有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对抗之中，而是通过抗父，最终相互达成了和解。小说一开场便呈现出一个残酷无情、专制暴虐的父亲形象，直接颠覆了亲情的神话，有暴力感，带有冲突对峙意味，直接奠定了小说的主题与基调：克里克家弟兄中排行最小的廖夫卡与柳布卡的女儿塔勃尔邂逅，三天三夜离家不归。第四天刚一回到家里便告知父亲，他看中了可爱的塔勃尔，没想到迎头遭到父亲的一顿咒骂。在克里克家中父亲生性残暴，父权主宰一切。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人伦法则在他身上完全不起作用——父亲心中没有任何禁忌。他常常以堂而皇之的声音斥责儿子，对他们实施严格的管教。似乎因为强大的血缘传承，天不怕地不怕的廖夫卡“听他父亲这么说，立刻卷起袖子，抡起一只连神都敢打的手向父亲挥去。”（巴别尔 2016a: 75）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父子关系中难以分离的另一元——廖夫卡的母亲戈罗勃奇克太太则“坐在丈夫身旁东张西望，那模样活像一个杀手”。她霍地一跃而起，插到父子二人中间，尖叫着怂恿丈夫：“给我扇廖夫卡一个耳光！这个孽种一下子吃掉了我十一个肉饼……”（巴别尔 2016a: 75）廖夫卡在父亲那里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和认同。为了免遭伤害，他背弃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选择了逃离和反叛。他与长兄别尼亚聚在一起，对父亲既痛恨又恐惧，因为与父亲有源自血缘的同性。“报复心像发酵那样越胀越大”，最终他们决定为大众除害，狠狠地教训一下独裁的、歹毒的父亲，取而代之：

“咱们下手吧。大伙儿都会感激得跪下来吻我们脚的。咱俩除掉老爸，这个门德尔大伙儿都不再叫他门德尔·克里克了。莫尔达万卡都管他叫屠犹者门德尔。咱俩动手把老爸干掉，还有什么可等的？”（巴别尔 2016a: 75）

父亲克里克的欲望无边，垄断了所有资源。克里克弟兄们觊觎父亲的特权，但他们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暴戾的父亲无疑成为儿子们嫉妒的对象。于是父子间展开了一场“改朝换代”的生死决战：

“街坊们，老板们！门德尔·克里克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打了声招呼，放下了鞭子。‘瞧我的亲骨肉，他们要对我动手。’

老头说罢，跳下马车，扑到别尼亚跟前，朝着他的鼻梁就是一拳。这时廖夫卡冲了过来，尽其全力将他父亲一顿乱打。他把他父亲的脸当作一副新纸牌，洗了又洗，括了又括。可老头是用魔鬼的皮缝制成的，而且缝皮用的是钢丝。老头一把将廖夫卡的臂肘扭脱臼，把他撂倒在他哥哥脚边。他骑到廖夫卡胸脯上，女人们都闭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老头儿牙齿被打光了的嘴和鲜血淋漓的脸。就在这一瞬间，住在无奇不有的莫尔达万卡的居民们听到了特沃伊拉快步跑来的脚步声和吼叫声。

‘为了廖夫卡，’她喊道，‘为了别尼亚，为了我特沃伊拉，为了所有的人。’随即抡起漏勺死命地朝老头儿的脑袋砸了下去。”（巴别尔 2016a: 80）

一边“父子大战”，另一边父女抡勺相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场相生相克的父子角力逐步升级。最后，这场在莫尔达万卡空前绝后的“三打一”混战以父亲的“完蛋”、“报销”而告终。这一段堪称全篇绝对的高潮，带有强烈的戏剧效果。父亲被暴打后几欲昏厥，脸上一道道伤痕，落下了残疾。他被逼无奈，只得告饶：“儿子把我往死里打。让儿子他们当家吧。”通过联合，克里克弟兄们有勇气去做并做成了单凭他们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的事情，终结了以父亲为主导的父权家长制家庭形态。最后的胜出者别尼亚接替父亲，成为“门德尔·克里克父子货运公司”新的掌门人。“不认输”的别尼亚·克里克重振家业，登顶自己商业帝国的主宰者和莫尔达万卡地下世界的“国王”。克里克家房子上挂上了“光华四射”的蓝底金字的新招牌。父子间一段沉积已久的历史恩怨终于了结。以上所述为小说表层文本的基本形态，但巴别尔明显不满足于此，他另外还为小说增添了一层象征意义。“在犹太文学传统中，父亲常常是以一个失败者，抑或是以丑角的身份出现的。”（乔国强 2008: 105）“与《骑兵军》中所描写的旧世界相同，跨越时代的界限，古老的敖德萨成为被毁灭的对象。”（Ли Су Ен 2005: 143）小说题目“закат”意为“日落；暮年、末日、终结”，隐喻了父辈的地位江河日下，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一个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

需要强调的是，“父子之争”在犹太文化根源和历史经验上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巴别尔小说中隐喻的“父与子”主题与其双重文化身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放在犹太宗教背景下去理解《日薄西山》中的情节，便会发现其逻辑依据。“父与子”的文化母题，即《旧约》中亚伯拉罕和以撒³的主题，是犹太文化的重要内容。一切以父亲为支柱的家庭成就了既传统又独立的犹太世界。《日薄西山》是反映犹太文化及“父与子”主题的典型作品，其中的父子关系具有深刻的犹太文化内涵。它既是对犹太文学传统中“父与子”这一历时性主题的移位运用，又以其鲜明的特点异于传统的父子关系。巴别尔借助于“父与子”主题，将犹太人的困境、《旧约》世界的日渐式微和遭遇解构作为整个人类困境的象征，对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社会文化状况进行了深邃、执着的哲理性思考，显示出超越种族、时空和国界的世界性普遍意义。

5 结束语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多个主题，这些主题背后隐藏着统一的人道主义思

想。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巴别尔不仅描绘了一幅国内战争参与者鲜活的全景图，也透视出每一个细节中隐藏的权力矛盾、文化斗争和政治对立。巴别尔的每一篇小说，无论其背景是在敖德萨，还是国内战争前线，无论其题材是战争，还是莫尔达万卡地下世界的真实生活，都试图通过夸张、奇崛的浪漫主义文学语言展现一种远远不同于过去文学叙事中的世界图景。通过对新题材和新语言的开掘，巴别尔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正统“国内战争”叙事背后的伦理尺度进行一定高度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巴别尔的作品被视为 20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文学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道风景。从人道主义的主题中又衍生出了知识分子主题和暴力主题。此外，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巴别尔对“父与子”的文化母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巴别尔以写实的方式和尖锐的发问逼近现实世界，直接劈开生活的肌理，借助多种小说元素提升“父与子”主题的分量，凸显出其对这一母题的独特思考与思维倾向。上述多个主题互相强化，形成了巴别尔小说的复调特征。

附注

- 1 犹太教牧师。
-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 3 《圣经》神话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

参考文献

- [1] Ли Су Ен.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Конармия”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оэтика циклов [М]. Москва: Мир, 2005.
- [2] Подобрый А.В. «Диалог»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х традиций и принципы построения образа поликультурного мира в новеллах «Конармии» И. Бабеля [J]. Вестник ЧГПУ. 2008. № 6. 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е.
- [3] 巴别尔. 巴别尔全集（第一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a.
- [4] 巴别尔. 巴别尔全集（第二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b.
- [5] 刘洪一. “父与子”：文化母题与文学主题——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主题模式 [J]. 外国文学评论, 1992(3).
- [6] 乔国强. 美国犹太文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The Theme of “Father and Son” in Babel’s Short Stories

Xie Chun-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Father-son conflic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nd prominent themes in Western 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Russian literature follow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Father and Son” cultural motif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universal thematic model. The art world of Babel appears as the absolute power and the decline and collapse of the majesty of the fathers, and the children replace the fathers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main character structure of Babel’s novels confirms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from the universal value of man. Here Babel does not intend to judge the moral values as positive or negative, but understands and presents the facts of cultural change

in a state of moral division.

Key words: Babel; short story; theme; “Father and Son”

作者简介: 谢春艳 (1969—),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文学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8-09-03

[责任编辑: 刘 锐]